

明代凤阳府和徽州府书院发展之比较

张晓婧¹,李琳琦²

(1.安徽财经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安徽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提起明代的安徽,人们自然会想到当时以至后来在全国闻名遐尔的两大地域人群:凤阳乞丐和徽州朝奉。明代的风阳府和徽州府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凤阳府是“龙兴之地”、“帝王之乡”,而徽州府则是“商贾之乡”、“文献之国”;前者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而后者在经济和文化上则占有绝对优势。明代这两个府的教育各具特色,尤其是书院教育更是出现各异的发展。对两府的书院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书院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综合互动关系。

关键词:明代;凤阳府;徽州府;书院;比较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2-0005-05

一、明代凤阳府书院发展缓慢之原因分析

(一)明代凤阳府书院发展缓慢

“凤阳”这个地名,为洪武七年朱元璋赐予家乡的名称,这也是中国惟一个开国皇帝赐给家乡的御名。《中都志》载:“洪武七年,迁府治于凤凰山之阳,赐名凤阳。”^①它有两种含义:从狭义上说,是指今日的凤阳县(明初至清乾隆二十年,包括凤阳、临淮二县),位于淮河中游的南岸。从广义上说,是指明代的凤阳府(明初先后辖12州24县,后领辖5州13县)。本论文所指的“凤阳”是采用广义的概念,即是指明代凤阳府的区域。纵观明代凤阳书院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初年,凤阳书院的建置是个空白。明代凤阳最早建置的书院是天长县于成化五年(1469年)建立的始兴书院。在明王朝300多年的历史中,凤阳共建造了15所书院,但是有14所建于明朝中后期,尤其以嘉靖朝为最多。^②与同时期安徽其他地区书院发展相比,尤其是与徽州书院相比,凤阳书院的发展明显处于落后的地

位。明代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国包括安徽各地的书院都有迅速的发展,而作为明代开国皇帝的家乡,凤阳的书院发展却呈现出与其政治地位不符的趋势。

表1 明代凤阳府书院创办者身份(可考)^③

县别	书院名	创办者	创办时间
怀远县	西山书院	知县谢廷举	嘉靖十三年建
	真儒书院	知县郭翰屏	同上
灵璧县	正学书院	知县钟大章	万历年间建
天长县	始兴书院	知县易居仁	成化五年建
	同人书院	邑人王心、吴恕	嘉靖年间
盱眙县	敬一书院	知县沈梦斗	万历六年建
寿州	循理书院	学正黄士奇	天启二年建
	安丰书院	知州王蕙	不详
	涌泉书院	巡按御史杨贍	不详
	淮肥书院	知州庄相	不详
	淮南书院	知州刘天民	嘉靖初

从书院创办者(可考)的角度考察,明代凤阳府的书院大多是官办,官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几乎所有可考的书院建立者不是知州就是知县,而由邑人创建的书院只有一所。

收稿日期:2008-01-20

基金项目: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F)项目

作者简介:张晓婧(1981-),安徽凤阳人,安徽财经大学讲师;

李琳琦(1965-),安徽枞阳人,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教育史、徽学。

考察明代凤阳书院的建立者,可知在专制集权统治力量强大的凤阳地区,民间力量参与书院建设的微乎其微。

(二)明代凤阳府书院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1. 官学教育的相对发达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出于对家乡的桑梓情深而采取一系列振兴家乡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光集中体现在经济方面。在教育方面,朱元璋也是想方设法地提高凤阳人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朱元璋出身贫寒,虽没读过书,但对文化教育却十分重视。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对人才的选取更加重视,措施也更得力。洪武二年(1369年)谕中书省臣:“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生之旧。”^[3]对于家乡的教育发展,朱元璋更是不遗余力,但是这种不遗余力也主要是体现在兴办官学方面。除建立南京国子监外,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下令建设中都国子监。国子监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据《凤阳新书》卷3记载:中都国子监的正中是一座大成殿,殿内供奉孔子等人的圣贤像。此外还有彝伦堂、率心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博士厅、典籍厅、掌饌厅、厨库等建筑。它的四周围墙外栽种了松柏,戟门外还树立着大成、兴贤、育秀等牌坊。可见当时中都国子监的建筑十分宏伟,其规模、质量实属全国第一。

为了提高凤阳人的文化素质,办成全国第一流的学校,朱元璋把全国最好的老师派到凤阳任教。元末著名教育家、文人贝琼,就在中都国子监执教。而获得洪武四年浙江省乡试第一名的郑真,仅在临淮县当教谕。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考入中都国子监的监生有270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考入132人。在并入南京国子监之前,中都国子监的监生总数大约在1000人左右。

明朝的统治者对凤阳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各种便利,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办好官学,培养封建人才,对于自由讲学、争鸣学术的书院,明初的统治者未加重视,即使是朱元璋在明初下令修复洙泗、尼山两所书院,也并非重视书院的表示,而是出于祭祀孔子、尊崇儒教的需要。所以,对其家乡凤

阳,更无提倡书院发展的措施。明初,朱元璋下令在家乡建设中都城,使凤阳的政治地位一时之间处在极其显赫的位置。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凤阳府理应成为全国的首善之地。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应当带给凤阳府各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可以得风气之先。虽然明初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沉寂期,但一旦政策稍稍松动,凤阳府按理应能率先及时创办书院。十分遗憾的是不多久中都的建设就被停止,凤阳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也迅速下滑,从京师的天堂一下跌落到凡间一般的府州。所以到明代中后期,在全国书院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凤阳也没有得风气之先,甚至没有出现类似其他府、州的中心地带书院建设高潮的现象。

2. 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以来所发生的多次移民运动,大多为自发性的流民。这些流民大规模迁徙的原因,主要是移民输出地发生战争或者严重的自然灾害。说到底,这些移民应当称之为“难民”。而明代凤阳移民不同,它是在政府严密地组织下,利用行政手段,强行迁徙到凤阳的。如《凤阳新书》记载,洪武七年十月,“(太祖)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4]这样的举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据《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十六年,凤阳府人口为427303人,加上军籍人口约为71万。在这71万人口中,当地土著人口仅为17万,外地移民则占到了76%。洪武年间,朱元璋利用行政手段,仅仅数年,就使得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凤阳产生了奇迹,有50余万人从全国各地移居凤阳。如果说,明初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移民运动的话,那么明初凤阳就是这场运动中数量最多、最引人注目的移民区。^[5]

在这些迁徙至凤阳的移民中,文人移民备受历史的注目,他们中甚至有数位是当时名震江浙乃至全国的文人。翻开《明史》,我们可以看到大约有15%的文苑人物曾在凤阳“谪居”、“徙居”过。这些满腹经纶的文人们大多留下过诗集,很多人曾在政府或者家乡的重要文化部门任职。其中如苏伯衡曾在洪武三年任翰林院编修,吴伯宗曾任国子学教谕、翰林院检讨,张宣曾任翰林院编修。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在书院担任过山长,如蓝仁曾任武夷书院山长,唐肃曾任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这批文人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江南文化,但是他们来到凤阳之后却没有被当地的土著所接受,反而被偏见的政治、愚昧无知的地方观念彻底扼杀了。在凤

阳土著人的眼中,他们并不是什么文豪,而不过是皇帝发配到这接受改造的对象而已。

移民中的文人,即使背井离乡、生活困苦,而他们的读书、藏书、写作及对文化的嗜好却依旧如故。贝琼曾在文集中载:天台人李廷铉,谪居颍上,“读书一室中,泰然自足。”^{[6]卷24 芦野记}郑真在其文集中也记载到:松江夏士良在被谪居凤阳后,依旧耕读不息,“士良累世诗书,所守所养,一归于正。谪处不异家居。向在富贵不知其为富贵也;今在贫贱,亦不知其贫贱也”,“(士良)耕田饭牛,温饱仅足。暇日,取古金石遗文阅之,实与世相忘者焉。”^{[7]卷9 东湖草堂记}类似这种记载在史书中还有很多。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见当时这些谪居凤阳的文人们热爱文化、风雅相尚的景象。但是,当这些文人受到了政治的歧视,受到了愚昧无知的攻击和嘲弄,他们代表的文化也就失去了社会的承认和生命力。移民文化与凤阳当地土著文化的冲突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凤阳当地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并未因为有了先进文化的进入而得到提高。那些曾担任过书院山长的文人们未在凤阳建设一所书院,甚至没有过小规模的讲学活动。不仅如此,中都国子监在凤阳也办得很不成功,以致朱元璋不得不在洪武二十六年将它撤销,并入南京的国子监。凤阳当地人没有享用到移民文人带来的文化盛宴,失去了发展本地教育文化的一个绝好的机遇。

3. 宗族组织的不发达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明代黄淮一带因移民而形成的当地风俗,曾有如下记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8]卷3 江北四省}此风俗虽特指黄淮一带,但凤阳地区与此大同小异。凤阳人鲜修家谱,不仅是当地移民,而且连明初开国功臣的家中亦少有家谱。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虽多方寻找,但几乎查阅不到凤阳府的宗谱或者家谱。国有史、邑有志、族有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凤阳一地不续家谱、不立祠堂之风俗,说明了该地宗族组织的极不发达,同时也映衬了这里的区域文化十分落后。宗族组织的不发达造成了凤阳一地几乎无望族的出现。明代对于凤阳而言,最大的望族便是朱元璋家族,其次是徐达、汤和等明代开国功臣的家族。而明代,朱元璋的子孙全部离开了凤阳,在各自藩国中生活,仅有高墙成为关押罪宗们的地点。那些凤阳籍开国功臣们及其后裔也全部离开了凤阳,在

京城或全国各地为官。留在凤阳的族人,多为远系旁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地区望族的数量越多,这一地的文化、教育也就越发达。而明代凤阳一地宗族不发达,又无望族的支撑,直接影响到该地文化的发展。

二、明代徽州府书院发展昌盛及其原因分析

(一)明代徽州府书院发展的昌盛

明代徽州的书院教育十分兴盛,有明一代共建书院49所。^[9]从主创者的身份来看,可划分为官办

表2 明代徽州府书院创办者身份(可考)^[9]

县别	书院名	创办者	创办时间
歙县	紫阳书院	太守张芹	正德间
	北园书院	里儒凌庆四	明初建
	枫林书院	朱升	元末明初建
	斗山书院	知府冯世廉	嘉靖十年建
	崇正书院	知府冯世廉	嘉靖间
	南山书院	侍讲唐泰, 郑佐	嘉靖间
	天都书院	贡生吴经邦	崇禎十六年建
休宁县	心远楼	硕儒杨季成	明初建
	柳溪书院	里人汪尚和	成化间
	率溪书院	里人程希隆	成化五年建
	新溪书院	里人朱暹	明初建
	还古书院	知县祝世祿	万历二十年建
	明善书院	里人吴继良	万历年间
	海阳书院	知县王佐	崇禎八年建
祁门县	东野书院	里人谢熙和	明初建
	案山书院	里人程景华	明初建
	李源书院	里人李汛	弘治间
	东山书院	知县洪晰	正德末
	少潭书院	进士郑继诚	嘉靖间
	石龙精舍	知县钱同文	嘉靖中
	碧阳书院	知县谢廷杰	嘉靖四十二年建
绩溪县	望阳书院	里人程儒	弘治初
	龙峰书院	里人胡德裕	洪武九年建
	颖溪书院	知县赵春	嘉靖间
	谦如书院	状元陈于泰	崇禎间
	鹿草书馆	知县陈嘉策	万历四年建
	东湖精舍	巡抚欧阳公	嘉靖间
	福山书院	湛若水门人	嘉靖间
婺源县	虹东精舍	知县张櫺	嘉靖四十二年建
	中心精舍	合州知州金世儒 归里建	嘉靖间
	紫阳书院	知县曾忬	嘉靖九年建
	世贤书院	都御史游震得	嘉靖间
	尊罗书院	里人游震得兄弟	嘉靖间
	明德书院	尚书余懋衡	明末
	山雾书院	正学方權	明中叶
正经堂	尚书汪应蛟	明末	

和民办两种类型。与明代凤阳地区书院的主创者相比而言,徽州书院的一大特色即绝大多数书院都是民办书院。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法制度最为强固的地区之一,民办的书院主要是为宗族服务。此外,明代徽州书院另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即是讲会盛行。明朝中叶以来,这个“封闭”的山谷崎岖之地已是当时讲会盛行的地域之一,在晚明已形成了

徽州书院讲会的网络。

(二)明代徽州府书院发展昌盛的原因分析

1. 徽商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是学校教育、同时也是书院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经济的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明代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政府拨款、官绅捐助和自身经营。但是,徽州一地与全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书院经费基本上来源于徽商资助。明中叶后,徽州以“商贾之乡”而“富甲天下”,经商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为该地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酵母”。

徽商在步入商海之前,大都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一批具有较高儒学素养的商人。他们虽因生存所迫不得不弃儒服贾、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徽商的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经商只是解决经济基础的一种手段,用经商所得之厚利让子孙业儒入仕、显亲扬名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9]2-115}

正因为徽商的终极关怀是让子孙习儒业、入仕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商致富后,他们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资助可谓竭尽全力、慷慨不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明中期以后,“徽州的书院、馆塾之类的学习场所,大多是由商人或官绅倡修,由商人捐资兴建的。”^[10]如明弘治间祁门商人李汛建李源书院,并割田20亩入书院“以助族子弟能读书者”;^{[11]卷18 学校志}明万历年间休宁商人吴继良“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明善书院;^{[12]卷15 人物志}明后期黟县商人黄志廉率族重建黄村集成书院^{[13]卷7 人物志}等等。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书院,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书院文化。

2. 宗族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14]这些聚族而居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有完备翔实的宗族家法,有严格规定的尊卑秩序,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因此,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坚固的地区之一,并“堪称为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15]

徽州宗族大多来源于中原的显宦之第或儒学世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他们深知,宗族要发展壮大、强盛不衰,要想在社会上享有威望,光靠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确立宗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所谓“族之有仕进,犹人之有衣冠,身之有眉目也”,^{[16]卷6}等等,即是指此。而要确立

宗族的政治和学术地位,保持科名不绝,只有通过发展儒学教育才能实现,正如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宗谱》卷上《冯氏家训十条》中“兴文教”一条所言:“一族之中,文教大兴,便是兴旺气象。古来经济文章无不从读书中出。草野有英才,即以储异日从政服官之选,其足以为人光、遗后人休者”。

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都有强烈的教育追求,许多宗族都将创设教育机构,“悉力扶植”族内子弟业儒,注意挑选那些所谓“器宇不凡”的族内子弟着力加以培养作为宗族内的重大事务,并将其作为宗族规范书之于族规家训之中,张贴于祠堂祖屋之上,让其子孙时刻谨记、世世遵守。^{[9]37-140}明中叶后,徽州的书院十分兴盛,而这些书院大部分都是由宗族主持创办的,由宗族来组织管理的。如:休宁的率溪书院是率溪程氏于明弘治五年创设的;休宁的明善书院是高山吴氏于明万历年间兴建的;婺源的明经书院是考川胡氏于元初创立的,元末“火于兵”,到明成化和万历年族人分别重建、重修。^{[9]60-69}“建立一个向士人社会开放的书院,是一个家庭提高自身声望,表明其对于地方精英身份诉求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投资,以财产来交换地位。”^[17]美国学者琳达·沃而顿(Walton Linda A.)在研究南宋书院与社会关系时所作的论述也可视为明清徽州宗族积极创办书院的心理写照。

3. “心学”的流布为徽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学术资源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学术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明中叶,陈献章远承陆学余绪,提出“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思想,反对朱子的“格物穷理”之学。这标志着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18]下卷一 献章而后}明代心学分为“王、湛两家”:王守仁“宗旨致良知”;湛若水“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心学兴起后,特别是王守仁“致良知”学说的出现,迅速传播全国,“学其学者遍天下”^{[19]卷1 答薛仲升论刘子节要},以致“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0]卷28}。心学遂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明中后期占全国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

心学兴起后,随即影响到徽州地区,明嘉靖以后,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了心学肆意流布的地域。为了攻破徽州这个固守程朱理学的顽固堡垒,一方面是信奉心学的徽州士子和官绅纷纷在徽州创办书院,如信奉甘泉之学的徽州知府冯世雍

于嘉靖间创建歙县斗山书院和崇正书院、信奉阳明之学的休宁知县祝世禄于万历年间倡建休宁县还古书院、信奉阳明之学的徽州知府留志淑与祁门知县洪晰于正德末年创建祁门县东山书院、湛若水门人于嘉靖间兴建婺源县福山书院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心学家们鱼贯前往徽州主讲席、兴讲会,扩大心学在徽州的影响。雍正《紫阳书院志》卷18载:“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年),甘泉湛先生主教于斗山,庚戌(二十九年,1550年)东廓邹先生联合会于三院;厥后,心斋王、绪山钱、龙溪王、师泉刘诸先生递主齐盟,或主教于歙(县)斗山,或缔盟于休(宁县)天泉、还古,或振铎婺(源县)福山、虹东,以及祁(门县)东山、黟中天诸书院。”正因为如此,才有天启间阉党张讷的“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20]等3省建志·学校之说。所以说,心学的传播是促进明中后期徽州书院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书院的发展与区域文化、教育传统、社会经济、宗族力量等方面存在强烈的互动关系。文中详细分析了明代安徽两府书院发展的不同特色及形成原因,以期作为明代安徽书院研究中南北比较的个案。

参考文献:

[1]中都志[Z].四库全书本.

- [2]李琳琦,张晓婧.明代安徽书院的数量、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4).
- [3]张廷玉.明史[M].四库全书本.
- [4]凤阳新书[M].天启元年刊本.
- [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6]贝琼.清江文集[M].四库全书本.
- [7]郑真.荜阳外史集[M].四库全书本.
- [8]王士性.广志绎[M].四库全书本.
- [9]李琳琦.徽州教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 [10]张海鹏.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序[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1).
- [11](同治)祁门县志[Z].同治十二年刊本.
- [12](道光)休宁县志[Z].道光三年刊本.
- [13](同治)黟县三志[Z].同治九年刊本.
- [14]陈去病.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15]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C]//周绍泉,赵华富.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 [16]吴翊.著洲吴氏家典[Z].雍正刊本.
- [17]Linda A.Walton,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China*[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I Press,1999.
- [18]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9]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M].梨洲遗著汇刊本.
- [20](道光)徽州府志[Z].道光七年刊本.

责任编辑:张德学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Fengyang Academy and Huizhou Academy in Ming Dynasty

Zhang Xiaojing¹, Li linqi²

(1.College of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Bengbu233030, China;

2.Postgraduate Institut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24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both Fengyang and Huizhou enjoyed some specialty. As the hometown of the emperor, the former was in the political front, while the latter held sway in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education in these two places displayed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typically embodied by the academy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academies, this article aims at revealing the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among multi-factor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tc.

Key words: Ming Dynasty; Anhui; academy; culture